

居住改变中国

历经20年的居住大革命，中国社会、中国人已深刻演变

夏骏 阴山◎著

在此前的20年间，全中国85个城市，2000个城镇，随处可见忙碌的塔吊、忙碌的挖掘机和忙碌的建筑工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提高人民基本居住条件为主要目标的**居住大革命**，到今天以改善整座城市的居住环境为目的的**经营城市**风潮，忙碌的中国一直就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巨大工地。在全世界的赞叹声中，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速度建造着各种各样可以建造的东西——铁路、公路、桥梁、机场、街道、公园，而数量最为巨大的，当属住宅。**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当然不只是人民居住环境的改变，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乃至行为方式，到所有城市和乡村面貌以及社会形态的立体转型，它的影响力之大令所有人始料未及。

本书取材于冯仑策划、夏骏编导、杨澜监制的同名大型纪录片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夏骏 阴山◎著

居住改变中国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在 12 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居住改变中国》作品的基础上揉进了大量创作过程中搜集到的不便进入电视表现的资料和素材改写而成的。它是第一部透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变化的作品。和电视片相比,本书在纪录片的基础上,对“居住改变中国”这一宏大主题的诠释更加丰富和具体。以宏观的视角从不同的侧面对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中国人居住状况改变、城市和乡村面貌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行了立体的透视。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本书防伪标签采用特殊防伪技术,用户可通过在图案表面涂抹清水,图案消失,水干后图案复现;或将表面膜揭下,放在白纸上用彩笔涂抹,图案在白纸上再现的方法识别真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居住改变中国/夏骏,阴山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

ISBN 7-302-12324-1

I. 居… II. ①夏… ②阴… III. ①电视纪录片—解说词—中国—当代 ②居住—研究—中国
IV. I235.2 ②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914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徐 颖 张瑞洁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邓玲玲

印 装 者: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65×230 印张: 12.25 字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12324-1/I·65

印 数: 1~8000

定 价: 36.00 元 (附赠 DVD 一张)

序 言

生得有理 活得伟大

冯 仑

夏骏是个有心人。三年前当有人向我介绍夏骏并建议由他执导我们拟议中的电视片《居住改变中国》时，我听着就很兴奋。这不单是因为他曾点燃过我激情燃烧的岁月，还因为世事变迁、恍惚多年之后他站在我面前时仍然是一副激情燃烧的样子。之后的合作便是在燃烧的激情中完成的。两年过去了，一部由地产行业和文化学者合作、倾力演绎的大型电视专题片《居住改变中国》终于面世。原以为电视播出夏兄便可住手歇歇或移师再战，没曾想他却余兴犹未了，欲将这两年拍摄和讨论《居住改变中国》时的电视脚本、讨论、发言以及其他相关文字逐一检出，去粗取精，编撰成册。足见其探索精神的顽强。做个有心人，方为人上人，夏兄的形状便是注脚。

《居住改变中国》起先是我应邀为填充克林顿演讲空当而作的一次即兴演讲的题目，之后，杨澜慧眼识识，力促拍成电视专题片在阳光卫视播放，并通过其他媒体广为传播。为了做好片子我们除力邀夏骏执导之外，还请了许多地产领袖与文化精英共同就这一话题进行多次研讨，话题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居住方式及住房改革相关的方方面面，例如：福利分房制度的取消和住宅市场化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财产关系，有产者的范围迅速扩大，中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又如，大规模拆迁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规划水平的升级，使原有的街道格局和城市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革；其他如邻居关系的变化、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传统建筑的保护等等，亦多有涉及。而这一切，特别是未被摄入电视镜头的文化素材与思想资料，统统被夏骏和阴山先生装在这本书里。所以，这本书不是《居住改变中国》简单的文字版，而是一次独立的探索与梳理。但凡关心这一话题的人，看电视而不读此书犹如捧碗而失箸，食不甘味。

《居住改变中国》开播之时，传来制片人吴蓓冒险诞下九斤之女的消息，加上夏骏新书上市，真是令人感慨。添丁增口，住房更需扩大，足证夏兄的鼓吹言之成理。而夏兄的刀笔功夫也使啼哭中的女婴自觉生得有理，活得伟大。人生本无道理，说的人多了，便成了真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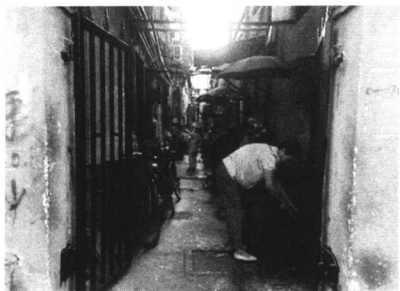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居住档案	1
◇ 永不摇晃	2
◇ 一模一样	7
◇ 筒子楼	9
◇ 上海的弄堂	13
第二章 产权与梦想	17
◇ 红色的第一乐章	17
◇ 望子成龙	22
◇ 富有的女公务员	25
◇ 千里购房记	26
第三章 一主二仆	31
◇ 反差	31
◇ 尴尬的物业公司	32
◇ 能干的居委会	35
◇ 房子漏水了	37
◇ 二百五居委会和三百元主任	38
◇ 主人	39
第四章 公民权益	42
◇ 特殊的合同	42
◇ 舒可心印象	44
◇ 斗争的策略	46
◇ 公益心	48
◇ 有产者	50
◇ 兼济天下	52
第五章 都市村庄	55
◇ 告别农田	56

◇ 都成了房东	59
◇ 祸起萧墙	61
◇ 有得必有失	62
第六章 苍坡之变	67
◇ 能人	67
◇ 古老的苍坡	69
◇ 耕读传家	74
◇ 新房子 旧房子	76
第七章 胡同保卫站	83
◇ 胡同守护神	83
◇ 历史的慨叹	87
◇ 胡同悲歌	92
◇ 短兵相接	94
◇ 留住北京之魂	96
第八章 旧瓶新酒	98
◇ 石库门	98
◇ 旧瓶	101
◇ 新酒	104
◇ 修旧如旧	109
◇ 重燃激情	115
◇ 芙蓉古城	118
第九章 西子洋装	123
◇ 千年名城	123
◇ 破烂的城市	126
◇ 时间啊时间	129
◇ 异想天开	131
◇ 老外还是老外	134
◇ 车还是人	137
第十章 卖点制造	141
◇ 住在温江	141

◇ 觉醒	143
◇ 房地产记者	147
◇ 醉翁之意	151
◇ 鱼水相依	153
 第十一章 锁的故事.....	160
◇ 锁	160
◇ 锁都	162
◇ 锁王传奇	164
◇ 制锁人	169
 第十二章 双城记.....	172
◇ 冰山一角	172
◇ 历史的误会	174
◇ 再造一个新郑州	176
◇ 机遇与抉择	178
◇ 规划新城	180
◇ 宏伟蓝图	181
◇ 经营城市	185
 后记.....	188



第一章 居住档案

许多荒诞与离奇是历史造就的。当所有的人都对身边的荒诞与离奇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荒诞与离奇就变得很正常了。

——题记

“这些年变化真大啊！”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多年间，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当一位本地人和一位外地人聊天的时候，几乎都会说这句话。这几乎成了一句寒暄语。当一句话成为人们见面时的寒暄语，它一定表达着某种社会和时代的特质或特征。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句普普通通的话可能会是一种时代的标志。

中国的城市面貌变化之快，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再会有太多的惊诧和激动。一排排的老房子被拆除，一幢幢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这 20 多年，整个中国大陆不知道拆了多少老房子，更不知道建了多少新房子。

我们这里所说的已经和还在被拆除的老房子，是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大多数中国人都居住过的房子。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之小，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在狭小而雷同的房子里栖居的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求，几十年中，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仅仅是满足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对那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人均不到两平方米的住房，比如两代、三代同堂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等等——则更多地表现出麻木不仁。没有尴尬，没有抱怨，甚至没有梦想。

曾几何时，“单位”成了人们全部的依靠，一个没有单位的人会被看成是游手好闲、不正经的人，而缺少了单位的保护，一个人就会变得软弱无助谁都可以欺负。曾几何时，单位是一副盔甲，是人们的生存希望。人之所以甘心依附于“单位”，并不在于每月领到的区区几十元钱工资，而是一生都不能缺少的并且离了单位无从指望的可怜的那一小间住房。那时，单位领导最具威胁性的语言就是“收你的房子”或者“不分你房子”——单位手里的房子足以窒息人的一生（冯仑《住房私有化影响重大》）。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都住在以单位为领地的宿舍楼里，政府的一句流行口号就是“安排人民生活”。被“安排”着的人们排着队分房子，这

种状态的“结实”程度一度让人不敢去想像如果没有了“单位”将会如何(胡葆森《居住是历史的镜子》)。

老单元房、筒子楼、大杂院和石库门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遗存,至今也还在明媚的阳光下映衬着都市的繁华。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遗存必将一天天地减少,但从这些遗存中走出来并正在享受现代都市文明的人们,他们记忆中关于这些历史和遗存的印记,恐怕永远也无法抹去了。

■ 永不摇晃

“双年展”这个词汇是到 20 世纪末才为中国人所知晓的,尽管它并不像改革开放后涌进中国的其他舶来的新词一样家喻户晓,但搞艺术的人却都知道。在艺术界,“双年展”几乎成了领异标新和先锋前卫的代名词。它曾经使许多亦步亦趋的传统艺术家又爱又恨,爱的原因是因为它使人开阔了眼界,耳目一新;恨的原因是很多人想参加又参加不了,而且它打破了原有的“成功”的秩序——年轻的艺术家可以不用再熬到“人书俱老”,而可以凭藉新奇的想像和创意一夜成名。

双年展在英语中称为 Biennial,在意大利语中叫做 Biennale,是当代国际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是推出世界各国最新艺术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全国各地重要的艺术节,其重要性相当于体育界的奥林匹克或电影界的奥斯卡和戛纳。

1996 年,上海美术馆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双年展,到 2002 年共举办了三届。上海双年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锐意进取、积极开放的姿态,在国际国内逐渐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被公认为领导中国当代艺术的排头兵。

2002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3 时,第四届上海艺术双年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第四届上海艺术双年展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当代艺术与建筑艺术交融展示的大型展览。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艺术家和建筑师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都市文化与建筑问题上,他们通过绘画、摄影、文本、装置、模型、声音以及互动式媒体等多种艺术语言,向观众呈现了他们对展览主题的不同诠释。

这次展览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同样是空前的——在短短 50 多天的时间里,参观展览的人数就突破了 9 万。据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向阳介绍,在这数量庞大的参观人群中,既有艺术界、学术界的专家,有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大专院校艺术专业的师生,也有爱好艺术的普通市民,还有相当部分是从上海周边省市赶来的观众。聚焦的目光不仅来自国内,作为中国连续举办四届的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已具有了相当的国际知名度,大批海外的艺术机构纷纷派出团体或代表专程来沪参观。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韩国、挪威、德国、新加坡等十余个国家的海外机构,以及日本艺术大学、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等院校的师生等,都不远万里赶到上海参观 2002 上海双年展,因为在他们看来,2002

上海双年展已经成为今年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艺术活动的热点。

法中文化交流年代表团、英国文化基金会、《美国艺术》杂志、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韩国光州双年展考察团、法国马蒂斯美术馆等数十个海外机构纷纷派出参观团；美国《时代周刊》、日本 NHK、德国广播协会等数十家国外媒体和近百家国内媒体进行了报道。

如此盛况，在中国艺术展览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同时，由 24 位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建筑师创作的艺术作品，和 44 位职业艺术家的作品一道，出现在了中國最前卫、最激进的第四届上海国际双年展上。如此众多的建筑师参加一个艺术展览，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上海双年展已先后举办三届，前两届都是在华人范围内选择艺术家，以传统的“画种”观念组织作品。这一次终于打破了画种的限域，选择艺术家也只考虑其艺术的当代意义而不分国界与民族，从而使其向着国际化的方向迈出一大步。这一破例，在中国的展览史上无疑标志了一个新的开端。

无论是艺术家的作品还是建筑师的作品，所有参加展览的作品都与都市和建筑相关，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对话都缘自一个前无古人的主题——“都市营造”。这次双年展之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关注，就是因为它在被老百姓看作是荒诞和另类的前卫艺术中，贯注了城市、房屋、社区这一类最贴近大众和现实的主题。

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也在这一大背景下凸显出来。本届上海双年展主题为“都市营造”，意在对迅速推进的都市化进程，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中国面貌的新型城市建筑所导致的原有文化格局和生活形态的急剧变化进行探讨。以建设性的态度审视这一现实，思考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等当代全球文化发展的新课题，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家们认为，这次双年展引起轰动，与其主题“都市营造”以及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为世界焦点有关。同济大学教授伍江说，2002 年双年展以“都市营造”作为主题，切入上海这座迅速发展的城市的现实，让艺术家、学者、观众和所有关心上海发展的人乐于融入其中，在平等、宽松的空间里探讨交流。中央美院副院长范迪安说，“都市营造”这个主题在中国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针对性。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说，双年展是一个展示艺术家实验阶段艺术思考的国际平台，它结合文化艺术、城市建设对一些具有挑战性、针对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以上海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母体，来讨论“都市营造”。

首先提出第四届上海艺术双年展以“都市营造”作为展览的主题的人，是上海美术馆馆长方增先。方增先教授 1931 年出生于浦江南乡，是当代中国画成就卓著的重要画家之一，现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从 1996 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开始，他一直是展览背后的灵魂人物，不遗余力地推

动着双年展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2002年第四届双年展开始之前,他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本届上海双年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李旭说,“因为他是浙江人,经常回故乡,每次回故乡都非常失望地回来。为什么呢?故乡的房子全被拆得荡然无存了,他小的时候所记忆的那种小桥流水,那种田园农舍,那些古建筑,全都没有了。新造起来的房子又都是些非常不伦不类的,既不中又不西的房子——用最廉价的水泥材料,配上现在最暴发户式的那种蓝色的玻璃、铝合金的窗框。他看了以后很伤心,在浙江这么一个具有深厚人文历史传统的大省,看到那么多这样不伦不类的新民居,他感到特别的痛心,于是他就给我们大家提了一个建议:能不能在这一届双年展中关注一下建筑的问题?”

同样是这届上海双年展策展人的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伍江说:“前面几届展览一直是以比较传统的艺术形式为主,这一次上海美术馆提出,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宽一些,能够更多地把我们的目光放到城市。因为实际上,所有的艺术都来源于我们的生活。而城市在现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城市的变化非常大,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冲击也很大,整个的社会心态也随之在改变。实际上用艺术的眼光,用艺术的语言谈城市,谈建筑,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过去已有城市现状的一种反思,是批判性的;另外一方面是创造性的,即什么样的城市居住空间,是我们理想的居住空间。”

对历史与现状的反思和批判,在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得出人意料。在2002上海双年展上,有一件以楼房为表现对象的前卫摄影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在双年展的所有平面作品中,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件。这件作品的题目叫《永不摇晃》。作者是年仅29岁的前卫艺术家向利庆。作品由6幅高2.5米、宽1.26米的照片组成,画面上全部都是拼贴而成的单调的,甚至是乏味的老住宅楼。

在展览现场,这件出自中国一位普通年轻艺术家之手的作品,被放在了德国数码摄影大师安德利尔·革斯德(译音)作品的对面。两位来自国外的策展人——美国的阿兰娜·黑斯和日本的长谷川佑子都说,他们都特别喜欢这两个作品这样面对面地放在一起,在不同国度里,用同样的技术,一个是非常大师的,一个是非常新秀的,在这个天平上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非常有意思。(见图1-1)

中国人和外国人对《永不摇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外国人大多比较好奇,他们从远处看这件作品似乎只是一些巨型建筑,但是走近一看,却是由无数的建筑细节和建筑的局部拼合而成的。此时他们会有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他们说:“这样的楼真的是中国建造的吗?作品中的这些细节是从哪儿拿来的?”

这些令外国人感到惊奇的细节,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图 1-1 展览现场

然而即使是熟悉这些建筑的中国人也不曾想到,当艺术家把这些过去人们曾经熟视无睹的景象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力。

“上海的老百姓对这个再熟悉不过了,”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李旭说,“因为向利庆攫取的这些局部,全都是所谓的‘新工房’。上海人很惊讶地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元素,被切割拼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楼以后,会让人感到有些可怕。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极端的拥挤所带来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可能没这么极端,但是作品中的房子让他们看到了挤到这样的程度是一种什么样子,他们感到了一种恐惧。”

著名艺术评论家艾未未说:“《永不摇晃》系列通过摄影和电脑合成的画面,为我们展示了关于建筑、关于人的生活状态和风格的超现实世界。大量的形象切割和排列使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熟悉的楼宇、街道和城市。一切关于文化和风格的讨论与争议都在现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都市人以符号化的个体方式生存,以虚拟的网状结构彼此联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空间与空间之间彼此雷同。假如宇宙有更高级的生命存在,在其法眼俯瞰下来,所谓的都市,不过是精巧的蜂窝而已。这样的蜂窝,在一幅《永不摇晃》的拼贴影像中,再生动不过地呈现出来:层层叠叠的都市建筑,犹如一片人工营造的水泥森林。”

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伍江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但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不是很注意,也有人提出我们的城市空间好像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得比较千篇一律,没有特色。但是大家没有感受到,这样一种千篇一律,这样一种特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力?这幅作品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过去我们曾经生活的是这样一个城市空间。这样一种城市面貌,它使我们的生活相对变得缺乏选择性,比较单调,比较拥挤,层次也比较低。我们在居住的空间当中,很难领受到精神方面的需要。比如说文化的,美的,感情的,历史的,民族的这类需要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它只能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

存需要。”

万通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说：“这件作品看了以后让人感到很心酸。因为这些地方曾经都是我们儿时寄托很多梦想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玩的空间可能就是阳台的一个很小的局部，你再多往前走，就碰上了一个烂棉被，再伸手一抓，抓到一个破竹竿，抬高一下又撞到了一块尿布……童年时候的想像力，全都被窒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永不摇晃》的作者向利庆，1973 年生于浙江绍兴，1995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成为一位职业艺术家，专门从事前卫艺术创作。

《永不摇晃》能够参加以“都市营造”为主题的上海双年展，并在展览中脱颖而出，应该说完全是一个巧合。它显然不是专门为参加这次双年展而创作的，因为策展小组从酝酿展览的主题到正式开展，只给艺术家们留出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个作品当初的想法，产生在 2000 年。”向利庆说，“我要表现的是规模化的、统一计划下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样子的。有很多人把生活理想化了，他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比如他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有一个庄园，但往往做不到，人在这面前是无能的，我们希望生活得越自由越好，但现实环境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幻想而已。作品之所以叫做《永不摇晃》，是因为我所反映的是社会的中间部分，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东西，是社会的核心，是无法动摇的。”

为了创作这件作品，向利庆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向利庆挎着照相机，天天都在这样的楼里爬上爬下，他爬遍了杭州城里几乎所有的老居民楼。

“在众多同样造型的楼房面前转晕了，”他说，“这很容易就能拍到。跑到二楼拍一张，跑到五楼拍一张，然后居民大妈会来问，你是干什么的？而且她会一路跟上你，假如说你跑到二楼拍一张，她就跟着，跑到五楼下来然后再来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我已经碰到无数次了。我在制作这一作品时的代价就是在气喘吁吁的爬楼过程中被居委会的老太太一次次盘问，这时你才发现有那么多人在观察你。经常因为是不是已经爬过这幢楼而一遍遍清理脑中相似的已经模糊的印象，相同的造型使我深感某些无名力量的强大，人们用尽了全部的能力占有了其中一个格子，他们在窗口向外瞭望的惟一的风景就是对面那一幢楼，在那里他们或许窥见了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生活内容，或许他认为一切是应该这样的。”

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和内在动力大多来自生活与现实在潜意识中长期、大量的累积。向利庆创作这件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以往生活在他心中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永不摇晃》中的房子，就是他少年时代和他的家人一起居住过的房子。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这种房子最大量、最普遍地占据了所有中国城镇的空间，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统一的住宅样式。

■ 一模一样

在全国所有城市的政府档案馆中,都可以找到一份几乎完全相同的图纸。向利庆《永不摇晃》中的“蜂窝”,就是依照这样的图纸建造的。在国家建设部也有一份一模一样的图纸,不过建设部的那份图纸是全国所有这样的图纸的母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中,随着这份图纸的大量复制,图上的房子也被千篇一律地复制到了中国的所有城市。(见图 1-2)



图 1-2 前卫摄影作品《永不摇晃》

今年 70 多岁的吴藻生干了大半辈子建筑设计工作,退休前在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担任高级建筑师。他不仅住过而且亲手设计过《永不摇晃》中所展现的那种楼房。

“当时全国的居住水平都比较低,平均的居住面积每人两个多平方米,”他回忆道,“两个多平方米,相当于什么水平呢?如果是一户人家有 5 口人,居住空间也就相当于 10 来个平方米,再加上厨房、卫生间和过道的一些面积,加起来也不过是 20 多个平方米。当时的居住水平仅仅解决的是‘有’‘无’住房的问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只能仅仅满足于“有”“无”住房的中国城市居民,不仅在人均居住面积上小得可怜,而且住宅样式也千篇一律。

一模一样的外观,一模一样的颜色,一模一样的格局,一模一样的面积,这些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的计划经济时代,是极为普通和正常的。

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伍江说：“我记得当时全国都搞标准化的住宅设计，住宅的类型是很少的，因为当时也不主张社会的级别分得太多。实际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就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所以住房的大、中、小各种类型，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标准化的住宅都由国家按计划投资建设。任何单位要建房子都必须先打报告，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开工建造。“比如说单位里面有20个符合70平方米居住面积的这样一些对象，”吴藻生说，“这是处级干部了，一个人一个坑，就规定下来，20个人打报告就是20个人，建20套70平方米的住宅，多建一套也不行。”

不过，区别还是有的。这种区别仅仅体现在不同的等级上，职务不同，住的房子当然不一样。但这样的区别同样无法超越统一的约束，因为全中国的处长、全中国的科长、全中国的同一级别的干部，甚至同一级别的工人，住的都还是一模一样的房子。

“当时的住房分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吴藻生回忆说，“如果说一般的工人，都是45平方米以下，就是38~45平方米；到50平方米左右，就是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工龄比较长的工人；到了60平方米左右，就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的科技干部，或者是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70平方米的标准就是处级干部了；再上去的话，我记得厅局长的标准也没有现在高，只有90平方米。”

有一样东西在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可能只有学校里的学生或厂矿企业的单身汉还能看见——澡票。顾名思义，澡票就是洗澡用的票据。在计划经济下的票证年代，澡票和粮票、布票一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粮票、布票是因为生活物资的紧缺，但澡票并不是因为水的紧缺，而是因为居住面积的狭小——那时候的房子大多数是没有浴室的，于是洗澡就必须去单位的公共澡堂，于是便有了澡票。

人口在不断增加，住房面积却没有多大改变。两代、三代同堂，挤在二三十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并且一住就是二三十年，这在那个年代是不足为奇的。但这还仅仅解决的是睡觉的问题，睡觉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几乎都必须借助于公共空间。当然不仅仅是洗澡，还包括其他那些每天都必需的日常活动，比如做饭和上厕所。

吴藻生说：“公用的厨房，每户人家都是蜂窝煤的炉子，没有煤气，也没有其他的设备，厨房的通风问题和排烟问题，都还没有提到需要重视的层面上来。公共卫生间，4户、5户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也只有一个坑位；没有淋浴间，浴缸更加谈不上，洗澡怎么解决？都是到公共卫生间去解决。单位里面发福利的时候常常就会发一些澡票，供应给家属和职工过年、过节的时候去洗澡，洗澡是作为单位里面的福利来享受的。一般单位都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集中开几天，供应热水。因为家里没办法洗，大家都到外面去洗，所以到公共浴室里洗澡是很不方便的，常常要

排队。”

排队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现象。买东西要排队,洗澡要排队,上厕所也要排队,当然,分房子更要排队。买东西、洗澡、上厕所的排队,仅仅是“等”而已,而分房子的“等”却是一种人生意义上的“等”,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熬”。熬年头,熬资历,熬职位,只有这些都熬够了,才能有资格分房子。

今年44岁的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1984年至1990年期间曾先后任职于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等单位,是在老房子里出生长大而现在又在造新房子的人。“过去全国造房子用的是同一张图纸,也就是说全中国人民住的是同样的房子。”他说,“我们那时候就住在筒子楼的一间12平方米房间里,我经常跟太太调侃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咀嚼同样的食品,然后排出同样的‘秽气’,然后第二天打着饱嗝开会的时候全是一样的。为什么?你比如说我在机关里分鱼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到冷库去排队分鱼,然后我们在筒子楼里做,每家做鱼都互相参考,你是湖南人的做法,你是浙江人的做法,你是上海人的做法,你是东北人的做法,然后大家相互交流。但是不管怎么样,吃的都是一样的鱼,要不都是一样的牛肉,一样的大虾,或者一样的猪肉,最后排出的‘秽气’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计划经济,它不仅计划你的思想,也计划你的居住环境,更计划你的胃,计划你的排泄物。”

■ 筒子楼

在增补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筒子楼”是这样解释的:中间是过道,两边是住房,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的楼房,这种楼房俗称筒子楼。

相信很多人现在对筒子楼依然记忆犹新,尤其是中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几乎都曾经有过在筒子楼里居住的经历。

北京海淀区被誉为“中国的硅谷”,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这里就一直是全国科技企业、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最集中的地区。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些著名高校中,现在年龄在50岁以下的大学老师,无论是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是副教授、讲师,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在一种楼里居住过,这种楼就是冯仑所说的“筒子楼”。

“筒子楼里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朱自煊说,“我也住过筒子楼,我刚毕业结婚的时候就在筒子楼里分给我一个房间。那时候我们都吃食堂,自己不开伙。如果要做饭的话,就只好在门口过道放一个小的煤球炉,全是这么解决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东南隅,还能找到两栋典型的筒子楼,它们的名字叫东风楼。楼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首全国人民都曾经会唱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老

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东风楼几乎可以说是这所大学里现存的建筑中历史最长的几幢。如今的东风楼已经被整修一新，成了学生宿舍。过去东风楼里居住的，除了一小部分在读的硕士、双学士和博士研究生外，全都是学校教学研究任务最繁重的中青年教师。住过筒子楼的教师们没有人能说清楚东风楼的年龄，也没有人能说清楚从这几栋东风楼里，究竟孕育出了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

“文革”时期人民大学曾一度停办，1978年复校时，这三幢东风楼仍是军队士兵的营房，当时新入学的学生有不少人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据说当时为了争回这三幢楼做校舍，学生会曾经带领同学们到天安门广场进行过游行和静坐。这次规模不算太大的学生活动是否就是后来学潮的滥觞亦未可知。

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李世银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1983年入学，1987年读了本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他现在和妻子、孩子一家三口还住在静园——也就是和东风楼同时并存的老单元房教工住宅区的一套40来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里。在搬进现在的房子之前，他们一直就住在东风楼三层334号，那是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房间。

李世银说，这东风楼原来并排有三栋，现在中间一栋拆掉了，造了一栋十几层高的新楼。这些筒子楼估计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刚开始是当教室用的，后来改的宿舍。所以许多房间之间木头的隔板是后来加的，隔板很薄，平时在家说话从来都不敢高声，稍微大点声左邻右舍就听得清清楚楚。（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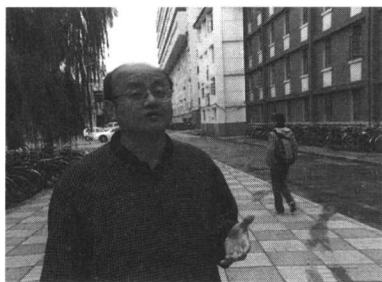


图1-3 李世银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过去老师都在里面住，”李世银说，“大概是1998年以前，留校的老师绝大多数都在这里有那么一段住筒子楼的经历。学校房源少，大家都要排队，排不到就只能住在这个筒子楼里慢慢等。那排队排得海了去了，排队那就得按你进校的校龄、工龄、职称、家庭人数等等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打分，要排很长很长时间。即使进筒子楼也要排队，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刚结婚的老师，他如果要想在这个筒子楼拥有一间房子，一般来讲也要排队，并不是说你一结婚就能有。”

东风楼每层的中间是一条100多米长、2米宽的过道，过道两侧是40多间房子，房间面积最小的10.5平方米，最大的也不过13平方米。房间的结构非常简单，一扇门，正对着一扇窗，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厨房，更不会有厕所和洗浴间。“厕所是公用的，”李世银说，“一层楼两个卫生间，这头是女卫生间，那头就是男卫生间。”